



张俊阁 / 著

后期近代 汉语方言 处置式类型学考察

HOUQI JINDAI HANYU FANGYAN
CHUZHISHI LEIXINGXUE KAOCHA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后期近代 汉语方言 处置式类型学考察

HOUQI JINDAI HANYU FANGYAN
CHUZHISHI LEIXINGXUE KAOCHA

张俊阁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期近代汉语方言处置式类型学考察/张俊阁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209-09542-6

I. ①后… II. ①张… III. ①汉语方言—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5696 号

后期近代汉语方言处置式类型学考察

张俊阁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542-6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引书体例及文中使用符号说明

1. 引书体例说明

- 1.1 本书在引用近代汉语时期的文献例句时用全称，并注明回数（或卷数）；有些用例还注明作者、作品名等。
- 1.2 本书在引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例句时，一般注明该例句所出自的方言片区或现代作品。
- 1.3 本书在引用古汉语文献中的例句时，一般只注明书名、篇目。
- 1.4 本书转引他人所举之例均注明所出之处，引例格式基本保持原貌。
- 1.5 书中引文、所用或所参考的他人观点，均用页下注注明作者、专著（或论文）的名称、出版（或发表）时间、出版社、刊物、期数、页码等（论文一般不注页码）。

2. 文中使用符号说明^①

符 号	代表成分	符 号	代表成分
N	名词	NP	体词性成分
V	动词	VP	谓词性成分
/	前后项均可	P	蕴涵项
Pro	代词	Q	被蕴涵项
S	主语	>	类型学上的蕴涵关系
O	宾语	()	注释或包括选择关系

^① 文中使用的其他一些符号，在文中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一、语言类型学及其发展简况

类型学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后又用于考古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19世纪被借用于语言学。简单地讲，语言类型学就是根据语言的结构特征对语言进行的分类。由语言类型学家对著作的命名及内容来看，语言类型的研究途径是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来探求语言的共性，并进而归纳出语言的类型。共性与类型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一步来讲，通过共性与类型的归纳，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也得到了凸显。语言类型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古典语言类型学和现代语言类型学。古典语言类型学也即传统语言类型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代表人物有Friedrich von Schlegel、August Schlecher、Wilhelm von Humboldt等，其主要成果就是依据形态把世界语言分为三类或四类：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和多式综合语），所以又称之为形态类型学。^①形态类型学虽然影响深远，但它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这种分类只是基于外部形态的分类而分类，我们并不能透过这种分类而了解某种语言现象及其隐含的规律。诚然，人们对语言外在形态的了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知识，但对语言内在规律的认识和解释更是人们研究语言的强烈推动力。在这一推动力下，Edward Sapir对语言类型的分类为语言类型学由古

^① Friedrich von Schlegel根据语素组合成词时是否改变语音把语言分为两个类型：“黏着语”和“屈折语”。前者用词缀表示单个语法范畴，与词根结合时基本不改变语音，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芬兰语、日语等都属于黏着语；后者用词缀融合多个语法范畴，与词根结合时语音发生很大变化，俄语、德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屈折语（英语、法语的词形变化经过历史演变已大为简化）。August Schlecher把既无屈折变化又无词缀的语言称为“孤立语”，汉语、彝语、壮语、苗语等都属孤立语。Wilhelm von Humboldt以北美土著语（美洲印第安人）为代表的有多个词缀附加在词根上的特点归纳出“多式综合语”（“多式综合语”又有人译为“复综语”“多重综合语”等）。



典迈向现代起到了一个铺垫作用。Edward Sapir 在其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一书中用一个章节专门讨论“语言结构的类型”(Type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指出所有语言都是有形式的, 语言的形式分为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 外部形式主要指形态, 并指出依据形态分出的类型是可以演变的。内部形式主要指词的功能与句法关系, 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了对语言的论述和分类。^① Edward Sapir 能够把词所表示的概念和句法关系及词的功能结合起来, 大大突破了以往单纯依据形态划分语言类型的桎梏, 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应是 20 世纪 60 年代, Joseph H. Greenberg (1966 [1963]) 发表的论文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 以 30 种语言作为语种库, 以描述多于结论性的语言论及了 45 个语序共性现象, 开创了类型学研究的新篇章——现代类型学。其与古典类型学的最大不同是: 在继续关注形态的同时, 把主要方向转向关注句法。在句法中, 关注最多和研究最为深入的是语序现象, 因此语序类型学是现代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或核心内容。在各种语序中, Greenberg 最为重视的是主语 (S)、宾语 (O) 和谓动词 (V) 的相对顺序。理论上讲, 这三个基本成分可以有六种排列语序: SOV、OSV、VSO、VOS、SVO、OVS。其中宾语在主语之前的三种语序 OSV、VOS 和 OVS 根本没有出现或至少非常罕见。Greenberg 由此得出第一个语言共性: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with nominal subject and object, the dominant order is almost always one in which the subject precedes the object.” (带有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 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处于宾语之前。)^② Greenberg 根据动词的位置分出 I 型 (VSO)、II 型 (SVO)、III (SOV) 三种最主要的类型, 也即优势语序类型。I 型 (VSO) 和 III (SOV) 两结构的语序几乎处处对立, 而 II 型 (SVO) 的类型特征并不一致, 不同的 II 型 (SVO) 语言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在 I 型 (VSO) 和 III (SOV) 之间徘徊。所以即使知道某一语言

① Edward Sapir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

② Joseph H. Greenber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66: 77.

是Ⅱ型(SVO)语言,也很难预测其其他方面的语序,因而 Greenberg 归纳的与主宾语有关的 15 条共性中,没有一条涉及Ⅱ型(SVO)语言。而汉语恰恰是Ⅱ型(SVO)语言,从类型的角度来比照,汉语充满了“例外”。Greenberg 之后的类型学家 W. Lehmann 和 Vennemann 都把动宾结构看作句子核心,认为可以忽略主语(S)在语序类型学中的作用,他们把 Greenberg 的优势语序 VSO、SVO 和 SOV 简化为 VO 和 OV 两种。^① 这种简化是建立在基于和谐原则的双向蕴涵性共性的基础之上的,而 Greenberg 对语序的划分则是建立在单向蕴涵性共性之上的,二者有很大的不同。Greenberg 提出的蕴涵共性是对语言进行描写的形式表达,可用单向蕴涵命题“如果 P, 则 Q”表述。P 是蕴涵项,或“前件”;Q 是被蕴涵项,或“后件”。蕴涵共性体现了命题逻辑真值蕴涵在类型学上的应用。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就是^②:

+P, +Q	-P, +Q
*(+P, -Q)	-P, -Q

上面的表格是对蕴涵性命题的详尽表示形式,即通常所说的四分表。四分表显示出,在四种可能性中,有三种形式是存在的,即 +P + Q, -P + Q, -P - Q, 而 +P - Q 是不存在的。这就对“可能有的语言类型变异施加了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一种语言共性”^③。Greenberg 发现语序的蕴涵性共性大多只是单向蕴涵关系。“假如蕴涵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就不是逻辑上的‘如果’,而是‘当且仅当’。”^④ 尽管以双向蕴涵为基础的和谐最为可靠,但这种和谐在语序共性中只占少数,且有例外。W. Lehmann 和 Vennemann 有关 VO/OV 的语序分类是建立在基于和谐原则的双向蕴涵性共性的基础上的,但是语序的双向蕴涵关系是很少的,所以对语序 VO/OV 的分类也是不可靠的。

① Lehmann, Winfred P. *A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d its implication*. *Language*, 1973(49); *The great underlying ground-plans*. In W. Lehmann (ed) 1978; *Conclusion: the profound unity underlying languages*. In W. Lehmann (ed), 1978.

Vennemann, Theo. *Topics, subjects, and word order: from SXV to SVX via TVX*. In Anderson, John & Charles Jones (ed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Vol. 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4.

② 此表摘自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2 页。

③ 沈家煊《关于词法类型和句法类型》,载《民族语文》2006 年第 6 期,第 3~9 页。

④ 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1 页。



尽管如此,从现有的类型学论著来看,W. Lehmann 和 Vennemann 对语言 VO/OV 语序的分类至今仍有影响。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和谐性是 Greenberg 谈论与优势语序的关系中引出的,“A dominant order may always occur, but its opposite, the recessive, occurs only when a harmonic construction is likewise present.” “In similar constructions, the corresponding members tend to be in the same order.”^① 句子说明和谐性是与蕴含共性和优势语序相关的现象。Hawkins 的 *Word Order Universals* 则追求无例外的共性,并用量化的方式来处理和谐性。^② Dryer 的 *The Greenberg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扩充了材料,改进了方法,对语序和谐性提出了更有见地的看法。^③ 近些年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关注语序而且也注意语音、语义、词汇、语用功能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认知、语用、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尽管不同的语言类型学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他们都通过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比较寻求语言的共性,通过历时的研究探求语言演变的本质。因此,类型学不仅进行共时平面的比较研究,而且也通过历时的研究进行解释,历时研究的理论如语法化理论等是类型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方法。

二、处置句式及世界语言分布

“处置式”是王力先生根据对汉语的研究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凡用助动词把目的位提到叙述词的前面,以表示一种处置者,叫做处置式。”^④ 近现代汉语中,这类句子不一定都表示处置,加之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这类句子主要由介词“把”介引,所以有人主张称之为“把字句”。但是“把字句”不足以概括近代汉语中这类句式,因此我们仍采用“处置式”这一术语。汉语处置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使因因素 + (主语) + 处置介词 + 宾语 + 谓语

① Greenberg, Joseph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66 [1963]: 97.

② Hawkins, John, A.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③ Dryer, Matthew S.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1992 (1): 43 ~ 80.

④ 王力《王力文集》第二卷《中国现代语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

汉语有处置句式，世界其他语言中是否也存在这种句式呢？

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调查和记载，我国 56 个少数民族语言中，只有白语、布依语、侗语、京语、黎语、毛难语、仡佬语、彝语、畲语、佤语等十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处置句式。^① 这些语言从语序类型来看，只有彝语是 SOV 型语言，其余九种都是 SVO 型语言。从简志的描述来看，毛难语、仡佬语中处置介词直接借自汉语；布依语既有自身发展^②，又有汉语的影响；黎语受汉语影响 *dew*¹ “拿”义动词发展为处置介词。其余几种，则没有说明是否借自汉语或受汉语影响。另据海峰、王景荣研究，现代东干语中存有“把”字句。东干语是中亚地区的东干族使用的语言，东干族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来源于中国陕、甘地区的回族，现主要居住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干语是汉语陕甘地区的方言在中亚的特殊变体。由于远离汉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又受周边语言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的影响，形成了极具特点的“把”字句。^③ 因此可以说，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汉语及中国境内（或受汉语影响的境外）的少数民族语言，还未见其他语言中有处置句式。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处置句式是汉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根据汉语（包括汉语各方言）及其他几种语言，对处置句式的类型进行研究，无疑对世界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①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共 56 册，此处只注出有处置式的语言简志。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喻翠容《布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 年。梁敏《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 年。欧阳觉亚、程方、喻翠容《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 年。梁敏《毛难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 年。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王均、郑国乔《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 年。

② 周国炎《布依语处置式的来源及其发展》，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第 84～92 页。

③ 海峰、王景荣《现代东干语把字句》，载《南开语言学刊》2003 年第 1 期，第 49～54 页。



三、处置式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的选题视角及可行性

(一) 处置式的研究现状

自王力先生提出“处置式”这一概念，处置式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成果颇丰。从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处置式的历时研究。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处置式的来源。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种：(1)“把/将”处置式导源于连动式结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祝敏彻、贝罗贝、王力。^① (2)“把/将”处置式与上古汉语“以”字句有渊源关系：A. 一方面认为上古汉语“以”字句是“把/将”处置式的前身，一方面认为“把/将”处置句来源于连动式的重新分析，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 Bennett；^② B. “把/将”处置式来源于上古汉语“以”字句，通过“把/将”替换“以”而实现。(3) 处置式有不同的次类，不同次类的处置式来源不同，叶友文、梅祖麟、蒋绍愚、曹广顺等持这种观点，但他们之间的看法又有不同。梅、叶、蒋、曹认为“把/将 + O₁ + V (+ 于/与) + O₂” (O₁ ≠ O₂，这类处置式目前语法学界称作广义处置式) 型处置式承继上古汉语的“以”字结构；梅、叶认为“把/将 + O + (X) + V + (Y)”型处置式是在受事主语句的前面加上“将/把”而成、“把/将 + O + V”导源于连动式。而蒋、曹把“把/将 + O + (X) + V + (Y)”和“把/将 + O + V”归为狭义处置式，认为其来源是由连动式重新分析而成。除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外，蒋、曹还分出致使义处置式，且致使义处置式又分为两类：“把/将 + Sa + VP” (VP 可以是单个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述补结构)，这类处置式最初是由带使动意义的动宾句变化而来的；“把/将 + Sa + V + O”是由工具式发展而来

① 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载《语言学论丛》(第1辑)1957年，第17~33页。贝罗贝《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载《语文研究》1989年第1期。王力《汉语史稿》(1958)，中华书局，1980年。

② P. A. Bennett, *The evolution of passive and disposal sentences*, JCL, 9. 1, 1981.

的。^① (4) 处置式语义上的不同类别是同一句式发展演变的结果。冯春田指出：“从意义上说，汉语的处置式从处置的给、作、到以至于表示其他的处置，又出现致使义处置式，是处置式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同一基本类型的处置式本身的嬗变。”^② 杨平也有类似的想法^③，吴福祥则详细论证了汉语处置式的来源：连动→工具→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由广义或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④ 再者，就是“给”表处置的來源的探讨：如王健《“给”表处置的來源》、林素娥《北京话“给”表处置的來源之我见》等。

2. 处置式的共时研究。又可细分为二：（1）对历史专书或专题文献中处置式的综合性研究。其中对专书或专题文献中某一类处置式的综合性研究的主要论著有：如蒋绍愚《〈元曲选〉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论》、徐妍雁《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将”字句研究》、翟志祥《戏曲语言中非处置式“把”字句考察——从现代汉语处置式“把”字句说开去》、刘小玲《警世通言中的“把”字句研究》、边春丽等的《〈儒林外史〉中的把字句考察》、温志国《〈儿女英雄传〉中的把字句研究》、张蔚虹《〈歧路灯〉“把”字句研究》、傅书灵《〈歧路灯〉中的“把”字句》、丁建川《〈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等。对专书或专题文献中出现的各类处置式整体考察的主要论著有：如曹广顺、遇笑容《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杨正超《〈型世言〉中的处置式研究》，惠红军《〈五灯会元〉中的处置式》，高玉洁《〈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处置式》等。（2）对现代汉语处置式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相当多，其中对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王雪樵《山西运城话中一种“把”字句》，汪化云、郭水泉《鄂东方言的“把”字句》，杜承道《渭南话“把”字句的几种特殊表现》，林立芳《梅县方言的“同”字句》，孙立新《户县方言的把字句》，陈泽平《福州方言处置介词

① 叶友文《隋唐处置式内在渊源分析》，*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6. 1。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载《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2~378页。

②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0页。

③ 杨平《〈朱子语类〉的“将”字句和“把”字句》，宋绍年等编《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56~77页。

④ 吴福祥《再论处置式的来源》，载《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



“共”的语法化路径》，靳玉兰《浅析青海方言“把”字句的几种特殊用法》，王景荣《新疆汉语方言的“把”字句》，王东、罗明月《河南罗山方言“把+O+V+它”式处置句》，石毓智《汉语方言处置式的代词回指现象及其历史来源》《汉语方言中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复合标记》，韩栋《年昌方言表处置的“让”》，辛永芬《豫北浚县方言的代词复指型处置式》，陈山青、施其生《湖南汨罗方言的处置式》，胡德明《安徽芜湖清水话中的“无宾把字句”》等。

总体上看，处置式的历时研究侧重对处置式来源的演变及差异分析，共时文献研究侧重对单一文献处置式的考察。但是历时研究的文献资料很难准确地说具有历时地域单一性，共时研究虽然文献资料地域明确，但仅限于对某一方言处置式的描写，而且多集中在“把”字句和“将”字句，对明清时期出现的“拿”字句、“着”字句、“给”字句等并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现代汉语处置式的研究主要针对普通话“把”字句，方言处置式的研究多限于某一方言，缺少不同方言间处置式的共性及差异分析。

（二）本课题的选题视角

我国有大量的地域方言，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在我国有天然的优势。21世纪以来，随着语言类型学尤其是语序类型学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完全运用语言类型学来研究汉语及汉语方言的论著开始涌现：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试说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的类型差异》《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关照》《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类型学与方言学》《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邵敬敏、周娟《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学比较》，邵敬敏、王鹏翔《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型学的过渡格式研究》，邵敬敏、朱彦《“是不是VP”问句的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李蓝、曹茜蕾《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和“把”字句》，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吴福祥《粤语差比式“X+A+过+Y”的类型学地位——比较方言学和区域类型

学的视角》，吴福祥《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一的两种演化模式》，史有为《汉语方言“达成”貌的类型学考察》，唐正大《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关系化对象与关系从句的位置——基于真实语料与类型分析》《关中方言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类型学研究》，周士宏《汉语被动标志的类型学考察》，林素娥《汉语方言语序类型学比较研究刍议》《汉语否定副词“不”“没”的类型学初探》，王素平《山东方言[VP-neg]式反复问句的类型学意义》，王洪钟《汉语方言普通名词的定指表达类型》等的论著。由此可见，类型学的研究已触及到汉语的多个领域和具体问题。可以说，类型学已是国内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从类型的角度关注后期近代汉语处置式的论著还未见启动。所以亟待引进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处置式进行跨方言的宏观的比较研究。

（三）可行性分析

从类型的角度对处置式进行研究，必须要有大量可靠的方言文献材料为基础，但汉语从上古到中古乃至近代汉语前期，成系统地历史地反映某地方言的语料非常罕见，这给方言处置式的比较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但到了近代汉语后期，这种相关文献缺乏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该期出现了很多方言背景明确，可以充分反映某一方言语法面貌的通俗文献。本研究对后期近代汉语文献进行了梳理，拟使用如下文献：（1）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主要有：《杀狗劝夫》《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型世言》《何典》《海上花列传》《玉如意》《山歌》、“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九尾狐》《九尾龟》《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些文献主要具有吴方言背景，有的是典型的吴方言，如《何典》《海上花列传》《山歌》等；（2）北方方言背景文献，主要有：《老乞大》《朴通事》《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聊斋



俚曲》《红罗镜》《歧路灯》^①，这些文献反映了明清时期北京话、山东话、山

① 文献材料的方言背景及本课题所使用的版本：四大戏文《杀狗劝夫》《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为宋元南戏的明写本，作者均为浙江人，据《宋元四大戏文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紫箫记》，其作者汤显祖为江西人，据《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型世言》作者明末陆人龙，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具有吴方言背景，中华书局1993年版。《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江苏苏州人，成书于14世纪中期，为吴方言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成书于16世纪中期，为吴方言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三言”作者冯梦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齐鲁书社1995年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山歌》是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明代民歌集，绝大多数是用吴语写成的吴地民歌。“二拍”作者凌濛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包括《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部，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玉如意》是清代乾隆年间具有泰兴方言背景的一部长篇章回说唱本，清代严振先著。严振先出生于泰兴新市镇（现为新市镇），乾隆六十年进士。他的母亲“喜闻古事，他常给母讲述历史故事”，后来严振先“又根据本地风光、民间传闻，采用艺术手法，别出心裁地写成《玉如意》唱本，颇为母所乐闻”。全书共十六回，约十六万字，书中语句多来自泰兴方言俗语，为我们了解泰兴方言提供了重要的语料价值。泰兴市位于长江下游，江苏省苏中平原南部。泰兴境内的方言属江淮官话泰如片，处于官话方言区的最南缘（与泰兴一河之隔的靖江市则属吴方言区），介于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交汇处，从历史上看，泰兴方言多与北方方言相通，又有吴方言为基础，叶秀中校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何典》作者张南庄，主要生活于乾嘉年间的上海，乾嘉年间，上海归属松江府管辖，《何典》一书中（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的大量方言俚语，就出自松江，但也夹杂着一部分江苏南部和浙江东北部的方言（刘复发现其中有些方言出自温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海上花列传》作者清末韩邦庆，松江府（今上海市）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书中叙述语言用官话，而人物对白全用苏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合肥人，成书于18世纪初期，为江淮方言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江苏武进县人，成书于19世纪末期，为吴方言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九尾狐》一书，署名为梦花主人著。梦花主人的真实姓名应为江荫香，其生平事迹、乡籍里贯及其他著述均不详。《九尾狐》一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由社会小说社分六册刊发。全书基本上用流畅的官话叙述，人物的对话视语境的不同而夹杂运用吴语和其他方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九尾龟》，晚清著名小说，作者张春帆，出版于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齐鲁书社2010年版。《红罗镜》作者傅山，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其故乡度过的，《红罗镜》反映的是明清之际太原方言，据《傅山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歧路灯》作者李绿园，河南省宝丰县人，成书于1777年，为河南方言背景，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专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今辽宁省辽阳市，成书于18世纪末，为北京方言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满族镶红旗人，成书于1849年，为北京方言背景，西湖书社1981年版。《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学术界对其作者的推断虽有多种，但对其方言属性却有一致的认识，即书中反映的是山东济南历城、章丘一带的方言口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聊斋俚曲集》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书中反映的是鲁中淄川一带的方言，据《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西太原话、河南话等，它们地域色彩浓厚、语言风格较为统一，而且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可以为描写分析后期近代汉语发展演变情况提供很好的素材。可以说，这些方言背景相对明确的通俗文献的大量存在为地域性方言语法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

四、研究意义

后期近代汉语在汉语史中具有桥梁和枢纽地位，且该期涌现出了大量方言色彩浓厚、可以充分反映某一方言语法面貌的通俗文献，加之处置式主要是汉语及中国境内十数个少数民族语言中存有的一种句法结构，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天然的条件和重要的价值。

（一）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可以弥补单一方言处置式研究的不足

以语言类型学为理论框架，从跨方言的角度观察研究后期近代汉语处置式，通过跨方言的比较寻求方言间处置式的共性，再以方言共性为背景更透彻地揭示具体方言处置式的特点。可以说，类型学的研究弥补了单一方言处置式研究的不足，为单一方言处置式的研究提供了方言内部所达不到的视角。

（二）有助于研究现代方言处置式的特点及其来源

后期近代汉语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跟现代汉语方言密切相关。在类型学视野下对明清时期体现不同地域方言色彩的语料加以调查比较，不仅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处置式在各方言点的异同，而且有助于研究现代方言处置式的特点及其来源，并且有利于进行基于汉语语法事实的理论思考。

（三）有助于汉语语法史及方言语法史的研究

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语法史的研究是目前汉语语法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因而对后期近代汉语处置式进行跨方言比较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语法及方言语法史的研究都饶有意义和价值，用类型学的视角来研究方言句法将为方言研究提供全新的方法。

（四）有助于丰富发展类型学理论

就目前对世界上语言的了解来看，处置式主要存在于汉语及中国境内十数个少数民族语言当中，而且汉语方言数量众多，关注不同时空环境下形成的汉



语中处置式的类型特征，将会为人类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带来更为丰富的成果。

五、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回顾和梳理汉语处置式尤其是近代汉语后期处置式的研究概况，指出后期近代汉语处置式研究所具有的条件和目前对其研究的不足之处。

（二）简要介绍语言类型学与方言学之密切关系。

（三）以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如语法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为框架，以后期近代汉语不同的方言材料为背景，通过跨方言的比较寻求方言间处置式的共性，再以方言共性为背景更透彻地揭示具体方言处置式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处置式进行比较，找寻出古今汉语处置式的相似性和相异性。

（四）总结汉语处置式的类型学研究和语法化研究可以给相关理论带来哪些新的启示，同时指出汉语处置式研究中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类型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语言样本，从类型学角度进行的方言研究则需要充足的可靠的方言语料。目前从我国的整体研究来看，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方言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因而来源广泛的包括汉语各方言的语料库还没有建立，而且有些方言正在逐渐消亡。这对本选题的研究和其他从类型学角度研究汉语方言是一个直接的障碍。因此本研究广泛搜集和采用了现有有关方言处置式研究的成果，藉此对方言处置式进行比较和分析，概况其共性指出其差异。

目 录

引书体例及文中使用符号说明	1
前 言	1
第一章 后期近代汉语处置标记的类型学考察	1
第一节 后期近代汉语方言中的处置标记	1
第二节 后期近代汉语方言中处置标记的语义类型	6
第三节 处置标记的语法化路径	16
第二章 语序类型学背景下汉语处置式语序研究	55
第一节 “把”字句及早期语言学家对“把”字句的认识	55
第二节 语序类型学视野下的“把”字句语序研究	62
第三章 汉语处置句结构及处置语势类型	64
第一节 “把……给 VP”框式结构处置句	64
第二节 代词复指处置句	72
第三节 一般处置句	75
第四章 汉语否定处置句研究	77
第一节 否定处置句的限定	77
第二节 否定词位置与辖域相关性	79
第三节 处置句中否定词位置不同的背后动因及形成机制	82